

中国共产党 十次路线斗争资料

毛主席语录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一个路线，一种观点，要经常讲，反复讲。只给少数人讲不行，要使广大革命群众都知道。

历史告诉我们，正确的政治的和军事的路线，不是自然地平安地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而是从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一方面，它要同“左”倾机会主义作斗争，另一方面，它又要同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不同这些危害革命和革命战争的有害的倾向作斗争，并且彻底地克服它们，正确路线的建设和革命战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目 录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同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	(2)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同瞿秋白“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	(8)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同李立三“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	(12)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同罗章龙右倾分裂主义路线的斗争.....	(17)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同王明“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	(20)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同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路线的斗争.....	(30)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同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斗争.....	(35)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同彭德怀反党集团的斗争.....	(39)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同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	(43)
第十次路线斗争（暂缺）.....	(55)

中国共产党 十次路线斗争资料

（初 稿）

毛主席指出：“历史告诉我们，正确的政治的和军事的路线，不是自然地平安地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而是从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半个世纪以来，我们党经历了十次重大的路线斗争。这就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同以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为代表的六次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同以高岗饶漱石、彭德怀、刘少奇、×××、××为代表的四次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现将十次重大路线斗争情况介绍如下：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同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

陈独秀，一八八〇年生于安徽怀宁县一个封建官僚家庭，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内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代表人物，是中国革命的叛徒和托洛茨基陈独秀反革命小组织的头子。陈原为北京大学教授，因编辑《新青年》杂志出名。由于他在五四运动时期的名声和党在初创时期的幼稚，当了党的总书记。但是他根本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民主派。在他活动的初期，就明显地暴露出右倾机会主义观点。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后期形成了投降主义路线，导致了大革命的失败。革命失败后，陈独秀及其一伙，对于革命前途悲观失望，堕落为取消主义者，并和中国的托洛茨基分子结合在一起，成立了反党的小组织，叛变了革命，充当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派的走狗。一九二九年十一月被驱逐出党，一九四二年

死于四川江津。

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是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胜利发展的形势下形成的。中国共产党从一九二一年成立后，领导了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建立了革命的统一战线，进行了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随着革命运动的发展，革命和反革命的斗争加剧了，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斗争尖锐了。这种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就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和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同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集中表现在民主革命总路线问题上。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理论和纲领主要反映在他于一九二三年写的两篇黑文章和一九二六年他起草的四届三中全会扩大会议决议案里面。他认为中国革命应该是：“统率革命的资产阶级，联合革命的无产阶级，实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由“资产阶级握得政权”，然后再进行所谓社会主义革命，即“二次革命论”。毛主席为了批判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张国焘的“左”

倾机会主义。于一九二六年和一九二七年先后写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两篇伟大著作，提出了民主革命的总路线。毛主席说：“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革命的前途是民主革命胜利后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围绕总路线，在以下几个主要问题进行了尖锐斗争：

一、要不要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问题。陈独秀否认无产阶级是革命的领导力量，认为革命只能由资产阶级来领导。他诬蔑中国工人阶级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很幼稚”，“不是独立的革命势力”，“还没有自己阶级的政治斗争之需要与可能”，没有摆脱“神权帝王之迷信”。陈独秀

在极力贬低无产阶级的同时却大力吹捧：“资产阶级的力量究竟比农民集中，比工人雄厚”；“民主革命若失了资产阶级……便没有阶级的意义和社会的基础”。毛主席针锋相对地指出：革命只能由无产阶级来领导，不能把领导权交给资产阶级。毛主席说：“工业无产阶级人数虽不多，却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做了革命运动的领导力量。”毛主席指出：中国资产阶级分为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历来都是革命的对象”，是直接为帝国主义服务并为它们所豢养的阶级。“民族资产阶级是带两重性的阶级”，它不仅不能成为革命的领导力量，而且也不是革命的重要力量。这个阶级在一定时间和一定程度上可以参加革命，而在另一时期就会成为反革命的助手。在一九二六年大资产阶级的代表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提出“整理党务案”，阴谋篡夺领导权的时候，毛主席主张要针锋相对地斗争，组织力量进行反击。而陈独秀则说，这是由于我们党“包办事务太多引起的，是

发生了误会，要向蒋介石道歉”。由于陈独秀的投降主义路线，使蒋介石篡夺了国民革命军的军权和当时作为统一战线组织形式的国民党党权。结果，蒋介石在一九二七年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使革命遭受严重损失。

二、要不要农民同盟军的问题。陈独秀否认农民的革命性，反对农民运动。他诬蔑农民“散漫”、“保守”、“苟安”、“难以加入革命”。他指责农民运动“过火”，咒骂贫农是“痞子”，规定不许提出打倒地主、土豪劣绅的口号，反对农民组织武装。毛主席指出：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农民革命运动，“乃是广大的农民群众起来完成他们的历史使命，乃是乡村的民主势力起来打翻乡村的封建势力。”而贫农则是“打倒封建势力的先锋，成就那多年未曾成就的革命大业的元勋。”毛主席亲自领导了以湖南为中心的全国农民运动，点燃了农民革命的熊熊烈火。

三、要不要领导武装力量的问题。陈独秀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开始时，就自愿放弃党对

北伐军的领导权，百般限制工农武装。他说共产党在北伐军中，只能做政治工作，不能当官、掌权，否则就会变成军阀主义。对于工农武装始则限制，继则下令解散。毛主席同陈独秀放弃军权的投降主义进行了坚决斗争。毛主席强调指出党掌握枪杆子的极端重要性：有军则有权。在农村，党必须领导农民“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因为农民武装是一切反动阶级和反革命势力看了打颤的强大力量。当一九二七年国民党反动军官许克祥在长沙发动“五·二一”反革命政变的危急关头，坚决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一些同志发动十万农军攻长沙，致敌人于死地的时候，叛徒陈独秀立即派代表赴长沙，强令农军撤退，结果帮助了敌人，扑灭了这次革命火焰，造成惨重损失。接着在武汉的汪精卫正酝酿新的反革命政变，在这个成败关头，叛徒刘少奇紧跟陈独秀投降主义路线，命令解散武汉五千多人的工人武装，使汪精卫发动的“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得逞，造成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最后失败，使党的许多优秀干部和数十万革命群众惨遭反革

命杀害。毛主席在总结这次革命战争的教训时深刻指出：“在一九二七年北伐战争达到高潮的时期，我党领导机关的投降主义分子，自愿地放弃对于农民群众、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尤其是放弃对于武装力量的领导权，使那次革命遭到了失败。”“每个共产党员都不应忘记这个历史上的血的教训。”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以后，党中央在江西九江召开了“八七”紧急会议。毛主席参加了这次会议，并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会议批判和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撤换了陈独秀的领导职务，选出了临时中央政治局，毛主席当选为政治局委员。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总方针。会议以后，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了秋收起义，进入了土地革命战争新时期。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同瞿秋白“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

瞿秋白，一八九九年生于江苏常州“书香”

之家，机会主义分子，第一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中国革命的叛徒。一九二二年投机革命，混进党内。一九二三年在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选为中央委员。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是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追随者。大革命失败后，他由右变为极“左”。在“八七”会议上，担任党中央的领导职务，推行“左”倾盲动主义。一九二八年赴苏，一九三〇年回国住上海。一九三三年到江西中央根据地任工农民主中央政府人民教育委员。红军长征后，他留在江西根据地，一九三五年三月赴上海途中被国民党匪军所俘，随即叛变革命，写了反革命自白书《多余的话》。一九三五年六月被国民党枪杀于福建长汀。

瞿秋白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是在大革命失败后出现的。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党中央召开了紧急会议。这次会议是有功绩的。但是，会议在批判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同时，却滋长了“左”倾情绪，到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党中央扩大会议，就形成了以瞿秋白为代表的第一次“左”

个根本问题上。毛主席根据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具体分析了中国革命的实际，完整地解决了中国民主革命的道路问题。毛主席说：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在内部没有民主制度，而受封建制度的压迫；在外部没有民族独立，而受帝国主义压迫。因此，无议会可以利用，无组织工人举行罢工的合法权利。党的任务基本的不是经过长期合法斗争，进入武装起义，也不是先占城市后取乡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即“在乡村聚集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城市”的道路。毛主席指出：所以必须如此，是“因为强大的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反动同盟军，总是长期地占据着中国的中心城市，如果革命的队伍……避免在力量不够的时候和强大的敌人作决定胜负的战斗，那就必须把落后的农村造成先进的巩固的根据地，造成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伟大的革命阵地，借以反对利用城市进攻农村区域的凶恶敌人，借以在长期战斗中逐步地争取革命的全部胜利。”

李立三诬蔑毛主席的革命道路“是一种幻

想”，是“农民意识的地方观念与保守观念”，而提出了一条同毛主席的革命道路相对抗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立三路线不承认革命需要主观力量的充分准备，不承认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性和长期性。他们认为：“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建立全国政权，成为党目前战略的总方针”；而在主要城市组织暴动“是战略上要解决的问题。”在他这条所谓总方针下，制定了组织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攻打大城市的冒险计划。他们不顾红军的暂时弱小，下令集中各地红军攻打长沙、武汉、南昌、九江等大中城市；要求上海、南京、天津、广州、青岛、哈尔滨、大连等全国中心城市举行起义，以形成所谓全国革命高潮。提出了“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冒险主义口号。为了实现这一冒险计划，他们采取了错误的组织措施，将党、青年团、工会的各级领导机关，合并为准备武装起义的各级行动委员会，使一切经常工作陷于停顿；他们打击排挤党内不同意他们的错误主张的干部。“立三路线”时间不长，恶果很大。在白区造成党的

组织暴露，受到敌人很大的破坏，数万党员和革命群众遭到敌人逮捕和杀害；在苏区丧失了洪湖和广西左右江革命根据地，使红军遭受很大损失。

毛主席同“立三路线”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一九三〇年七月，毛主席给以李立三为首的党中央的一封信中，深刻地批判了“立三路线”，系统地阐明了当时的形势和党的策略。以李立三为首的党中央，于同年八月给毛主席的回信中，拒绝了毛主席的正确主张，重复他们“左”倾冒险观点。毛主席以极大的耐心说服了贯彻“立三路线”的党中央代表和红一方面军的干部，撤退了围攻长沙的部队。接着又说服了干部放弃夺取九江和其他大城市的意见，采取了分兵攻取茶陵、攸县、醴陵、萍乡、吉安等地的方针。从而开拓了赣西南和湘东的广大地区，使红一方面军获得很大发展，并胜利地粉碎了敌人的第一次“围剿”。

毛主席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指出，李立三“不懂得中国内战的持久性，因此看

不出中国内战发展中‘围剿’又‘围剿’、打破又打破的这种长期反复的规律……因此在红军还幼小的时代就命令红军去打武汉，命令全国举行武装起义，企图使全国革命迅速胜利。这就犯了‘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一九三〇年九月，党召开的六届三中全会，纠正了立三路线对于中国革命形势的极“左”估计，停止了组织全国总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计划，恢复了党、团、工会的独立组织和经常工作，因而结束了作为立三路线主要特征的那些错误。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同罗章龙右倾分裂主义路线的斗争

罗章龙，湖南浏阳人，右倾分裂主义者，中国革命的叛徒。一九二一年上半年混入共产主义小组，以后任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全国总工会党团领导职务。到过苏联，见过托洛茨基。罗章龙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和秋收起义时就犯有严重的机会主义错误，在一九二八年党的第六次全

国代表大会上，他不但不承认自己的错误，反而提出任何老中央委员都不能当选新中央委员的荒谬主张，遭到多数代表的反对。会后，对党的“六大”路线采取对抗态度。一九三一年一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前后，公开拥护托、陈取消派的反革命主张，组织派别，分裂党，叛变革命，一九三一年一月被开除出党。

罗章龙的右倾分裂主义路线，是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党内的两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又使革命受到了严重损失的情况下产生的。敌人的残酷屠杀吓破了他的胆，革命的暂时挫折使他产生了绝望情绪。他由不敢革命、害怕革命到公开反对革命。

罗章龙的右倾分裂主义路线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根本对立的。

一、在对待革命形势的分析上，一九三〇年一月毛主席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对中国社会的各种矛盾作了科学分析，而后指出：“如果我们认识了以上这些矛盾，……就知道反帝反军阀反地主的革命高潮，是怎样不可避

免，而且是很快会要到来。”毛主席在形容革命高潮即将到来时说：“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一个婴儿。”尽管瞿秋白、李立三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给革命事业造成了严重损失，但革命根据地和红军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仍然有了很大发展，并取得了第一次反围剿的重大胜利。可是罗章龙等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却认为，党经过两次“左”倾路线错误之后，革命高潮已经完结，革命已经彻底失败，党已经走上了崩溃的道路，“中国无产阶级无论如何不可能胜利”。

二、在革命任务问题上，毛主席认为，当时党的主要任务是巩固、发展红军和革命根据地。而罗章龙却认为，党在当时的任务只能是作“细小的”、“日常的经济斗争”。他公开拥护陈独秀取消主义，提出被开除出党的陈独秀、彭述之一伙“回到党内和党的领导机关”。

三、在党内的斗争问题上，毛主席历来主张

既要坚持原则，反对机会主义；又要坚持在马列主义基础上的团结统一，反对分裂主义。但是罗章龙等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以反对立三路线为借口，公开成立以他为首的“中央非常委员会”和“第二省委”、“第二区委”、“第二工会党团”等非法组织，制造党的分裂。罗章龙一伙还采用公开散发传单的低鄙手段，出卖同志，致使许多同志被捕牺牲。

鉴于罗章龙的分裂和叛卖活动，中央于一九三一年一月决定开除罗章龙的中央委员和永远开除其党籍。罗被驱除出党后，就卖身投靠国民党反动派，成为中国革命的可耻叛徒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忠实奴仆。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同王明“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

王明，原名陈绍禹，是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和抗日战争初期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汉奸、卖国贼。一九〇七年出生于安徽省六安县

的大地主家庭。一九二五年混入党内。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三〇年钻进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在中山大学期间，就和一些臭味相投的分子逐步形成反党宗派集团，即所谓“二十八个半布尔塞维克”。一九三〇年，王明一伙陆续回国。一九三一年一月在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篡夺了党中央领导权，推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抗日战争初期，王明又从极“左”跳到极右，实行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全国解放后，在刘少奇叛徒集团的庇护下，王明于一九五六年借口赴苏就医，卖身投靠了苏修叛徒集团。近几年来，他化名“马马维奇”，在苏修报刊上发表反动文章，恶毒攻击我们伟大的党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完全堕落成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

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是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战胜了“立三路线”以后，红军打破了敌人的第一次“围剿”的形势下出现的。王明一伙打着“国际代表”的招牌，无耻吹嘘自己是“百分之百的布尔塞维克”、“掌握了马列主义的全部真理”，在“反对立三路线”、“反对调和主

义”的旗号下，于一九三一年一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篡夺了中央领导权。王明硬把李立三“左”倾说成右倾，鼓吹“右倾依然是党内目前的主要危险”，发表了流毒全党的《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推行了一条比立三路线更“左”、危害更大、统治时间最长（四年）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即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进行了长期的斗争。毛主席为系统批判“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先后发表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等光辉著作，从政治上、军事上、思想上对十年内战时期党内两条路线斗争作了科学总结。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主要表现在四个问题上：

一、关于革命性质、形势和任务问题。毛主席英明地指出：“中国现时确实还是处在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阶段。……对外推翻帝国主义，

求得彻底的民族解放；对内肃清买办阶级的在城市的势力，完成土地革命，消灭乡村的封建关系，推翻军阀政府。”只有完成了这样的民主革命，才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阶段上去”。对于这两个性质不同的革命过程，既不能混淆，又不能割断。而王明一伙根本不懂革命的性质，更不懂得中国革命的不平衡性、曲折性和长期性。他们夸大资本主义在中国的比重，把反对资产阶级和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并列，甚至把城市小资产阶级也作为打倒的对象。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提出“毕其功于一役”的荒谬主张，企图超越民主革命的阶段，搞所谓社会主义革命。

“九一八”事变后的几年里，毛主席对当时形势、矛盾作了科学分析，指出当时“形势的基本特点，就是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国内阶级关系发生了变化，民族矛盾上升，阶级矛盾下降。“党的基本的策略任务……就是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者闭眼不看变化了的形势和阶

级关系；在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的形势下，提出了“保卫苏联”的错误口号，使党脱离群众。他们还鼓吹革命力量是要“纯粹又纯粹”。革命道路是要“笔直又笔直”。说什么“中间派是最危险的敌人”，因而采取了“一切斗争，否认联合”的关门主义策略。毛主席在批判这种关门主义时指出：“关门主义‘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都赶到敌人那一边去，只博得敌人的喝采。关门主义在实际上是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的忠顺的奴仆。”王明的错误路线使党没有能够利用“九一八”事变出现的有利形势，丧失了发展革命形势的大好时机。

二、关于革命道路问题。毛主席指出：当时国民党反动势力集中于城市，在乡村的统治比较薄弱，而“革命的胜利总是从那些反革命势力比较薄弱的地方首先开始，首先发展，首先胜利。”因此，中国革命只能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取得全国胜利的道路。王明一伙疯狂地反对毛主席的革命道路，诬蔑“山沟里没

有马列主义”，否定农村革命根据地。他们认为党的“第一等的任务，是用最大的力量去开展城市工人的罢工斗争”，硬要红军去夺取中心城市，以“实现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结果使党在白区的力量百分之百的遭到破坏。最后连他所把持的“左”倾临时中央在上海也混不下去了，不得不搬到毛主席所领导的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

三、关于军事路线问题。毛主席亲手缔造和领导了工农红军，规定了建军路线和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原则。在毛主席直接指挥和毛泽东思想指引下，红军和根据地人民取得了四次反围剿的胜利。王明一伙窜到根据地后，就用极恶劣的手段，排挤毛主席的领导，继续推行其“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他们在建军问题上，把毛主席规定的我军三大任务缩小为打仗一项；否定毛主席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瓦解敌军的三大原则，在政治上大搞形式主义。在作战问题上，他们反对毛主席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原则。提出了另一套所谓“新原则”或“正规原则”。在第五次反围剿中，他们开始实行军事冒险主义，提出“御

敌于国门之外”的错误口号和实行“全线出击”、“两个拳头打人”的战术，结果使红军陷入了严重被动局面。这时，他们转到军事保守主义，主张“分兵把守”、“处处设防”、“节节抵抗”，结果红军虽然英勇战斗了一年，但仍然未打破敌人的“围剿”。最后红军被迫撤出中央根据地时，他们又变成了逃跑主义，使红军完全处于被动挨打的地步，不到两个月，中央红军由八万人减少到三万人。

四、关于组织路线问题。毛主席规定了一条服务于正确的政治路线的组织路线。毛主席指出，党和人民群众必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搞好党群关系。在党内必须实行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团结一致，实行民主集中制，实行“**团结——批评——团结**”的原则。而王明一伙则实行宗派主义，破坏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取消党内批评的民主精神，提倡盲目服从，采取“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的手段，大批打击、处罚和撤换反对他们错误路线的干部，提拔同他们气味相投的人。

王明一伙在组织路线上最大的罪过是打击、排挤毛主席，夺了毛主席的权。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在江西南部召开的根据地党代表会议（赣南会议），由于王明一伙把持了会议，因此毛主席的苏区中央局书记职务，被“左”倾分子所篡夺。一九三二年八月在江西宁都召开的苏区中央局扩大会议，撤销了毛主席红军总政委和总前委书记职务，造成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红军被迫长征。由于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危害，使红军和革命根据地损失了百分之九十。

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一九三五年一月红军长征途中在贵州遵义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批判了王明机会主义的军事路线。肯定了毛主席正确的军事路线，结束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统治，确立了毛主席在全党的领导地位，挽救了党和红军，使中国革命转危为安。从此，我们党在毛主席为首的中央领导下，从胜利走向胜利。

从一九三七年起，我国革命进入了抗日战争时期。党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建立了抗日民

族统一战线，在这种形势下，王明从十年内战后期的极“左”变为抗日战争初期的极右。抗战开始，王明担任长江局书记，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妄图取消党的独立自主原则，提出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主张要把人民武装交给蒋介石，将抗日战争的领导权送给国民党，把抗战胜利的希望完全寄托于国民党。他所把持的长江局，不敢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武装，建立抗日根据地。因而使长江流域广大地区，发展人民武装力量，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丧失了有利时机，造成了很大损失。当时新四军的主要负责人项英贯彻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使新四军在一九四一年的“皖南事变”中遭受极大损失。在华北，彭真、彭德怀等人执行了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使革命力量受到很大削弱。

全党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对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一九三七年八月，毛主席在党的洛川会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就强调了党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问题；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毛主席作了《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针对王明投降主义路线告诫全党：“一九二七年陈独秀的投降主义，引导了那时的革命归于失败。每个共产党员都不应忘记这个历史上的血的教训。”并着重指出：“党内的主要危险倾向，已经不是‘左’倾关门主义，而转变到右倾机会主义，即投降主义方面了。”毛主席号召全党必须坚持抗战的领导权，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的原则。一九三八年十月，党在延安召开了六届六中全会。在会上，毛主席作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的报告和《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战争和战略问题》的结论，对王明的投降主义路线作了系统的、彻底的批判。毛主席尖锐地指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是不对的”，“我们的方针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共产党员不争个人的兵权……但要争党的兵权，要争人民的兵权。……在兵权问题上患幼稚病，必定得不到一点东西。”会上，撤销了王明长江局书记的职务，结

束了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

为彻底肃清“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恶劣影响，一九四二年毛主席又亲自领导了延安整风运动，进一步统一了全党的思想，使全党从思想上划清了真假马克思列宁主义界限，更紧密地团结在毛主席的周围，为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同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路线的斗争

张国焘，一八九七年生，江西吉水县人，老机会主义者，个人野心家，革命的叛徒。一九二〇年投机革命，混入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多次犯过“左”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在他开始搞工人运动时，就进行无原则的小组织活动。在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他是“左”倾机会主义的代表。在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反对建立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政策。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支持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大革

命失败后，对革命表示极大的动摇，同情陈独秀的取消主义。一九二七年反对“八一”南昌起义。一九二八年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上，他又是右倾机会主义的代表，进行小组织活动，反对中央。此后，在苏联学习三年，联合托派分子，进行反党活动。一九三一年回国，窃据鄂、豫、皖苏区中央局领导职务，推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一九三五年长征途中，进行分裂活动，自立伪中央，最后叛变革命，当了国民党的特务。一九三八年四月被开除出党。

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路线是在遵义会议之后，在红军长征途中的艰苦情况下形成的。正如毛主席指出的：“张国焘的机会主义，则是革命战争中的右倾机会主义，其内容是他的退却路线、军阀主义和反党行为的综合。”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同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路线的斗争，主要表现在三个问题上：

一、在对待中国革命前途问题上，张国焘从右倾机会主义的立场出发，对中国革命形势作了悲观的估计。他过高地估计国民党反动派的力